嶽麓書院志

【明】吴道行
【清】赵　宁
邓洪波　谢　丰
等修纂
等校点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惟楚有材

岳麓书院志

於斯為盛

【明】吴道行
【清】赵　宁
邓洪波　谢　丰　等修纂
等校点

岳麓書社
·长沙·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谢清风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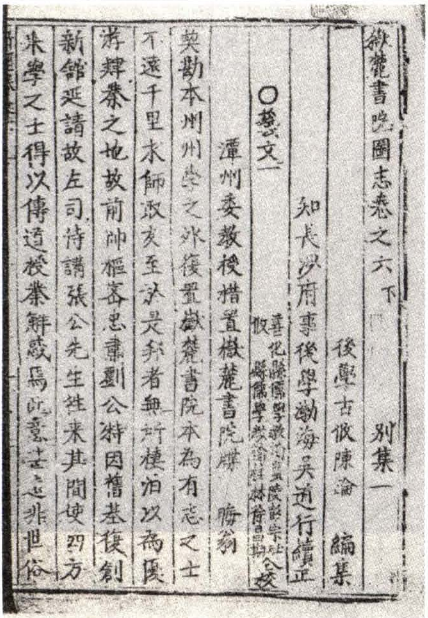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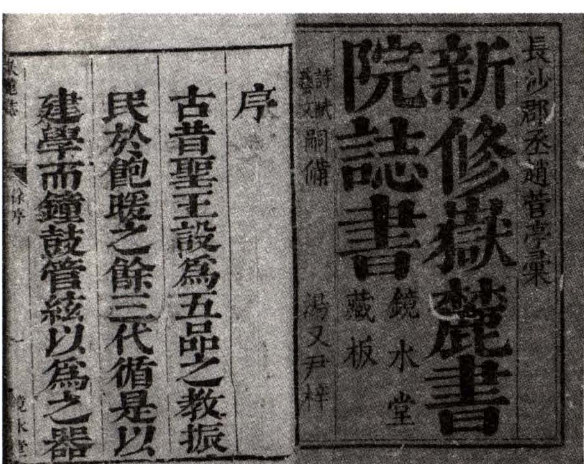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嶽麓書院圖志卷之六下　別集一
後學古攸陳論　編集
知長沙府事後學劉海吳道行續正
○藝文一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為有志之士
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為優
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
新館延請故左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
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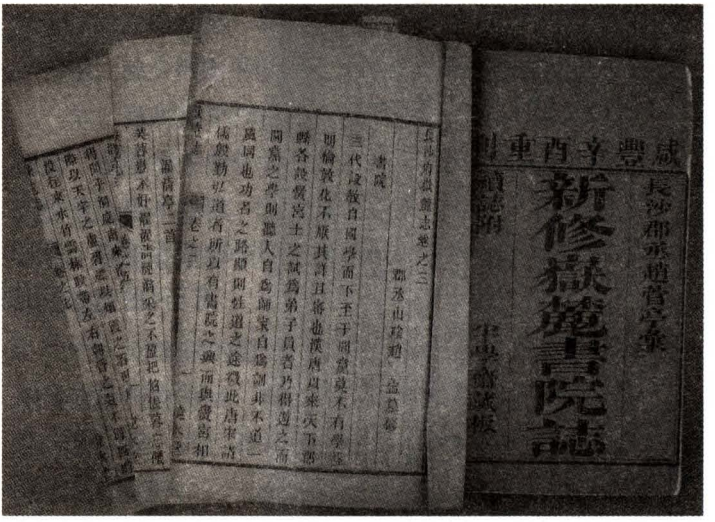
万历《岳麓志》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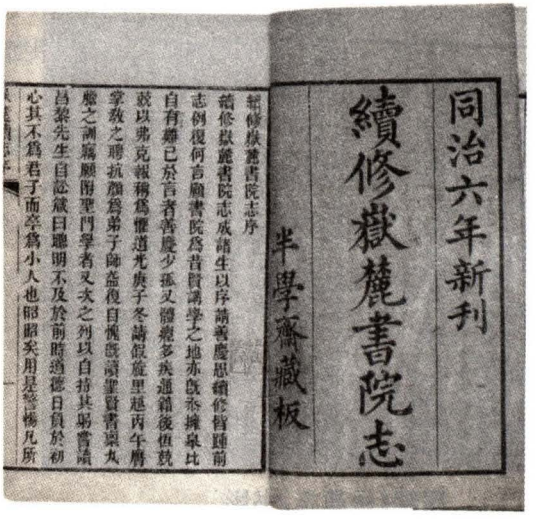
新修嶽麓書院誌書
詩賦藝文嗣備
鏡水堂藏板
馮又尹梓

序
古昔聖王設為五品之教振
民於飽暖之餘三代循是以
建學而鐘鼓管絃以為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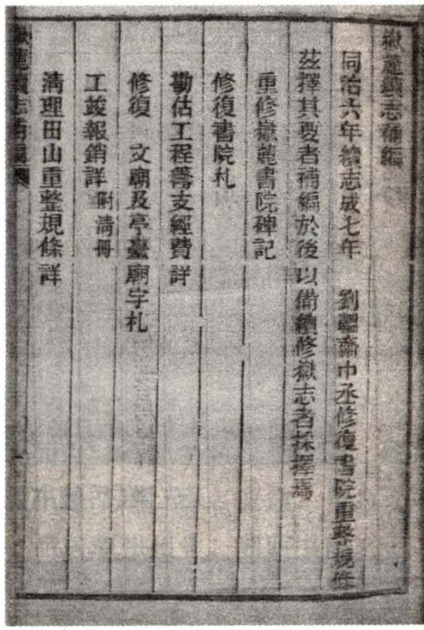
康熙《岳麓志》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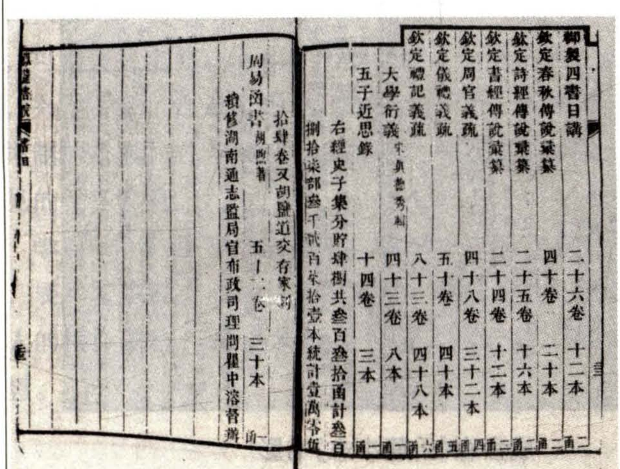
康熙《岳麓志》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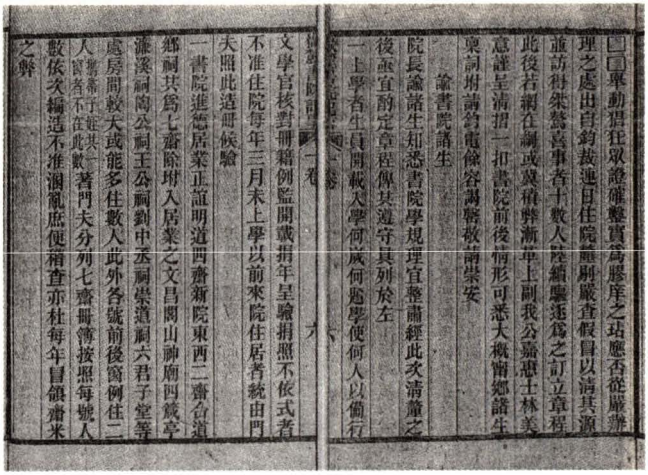
同治《岳麓续志》书影


嶽麓續志補編
同治六年續志成七年　劉韞齋中丞修復書院重整規條
茲擇其要者補編於後以備續修嶽志者採擇焉
重修嶽麓書院碑記
修復書院札
勘估工程籌支經費詳
修復　文廟及亭臺廟宇札
工竣報銷詳附清冊
清理田山重整規條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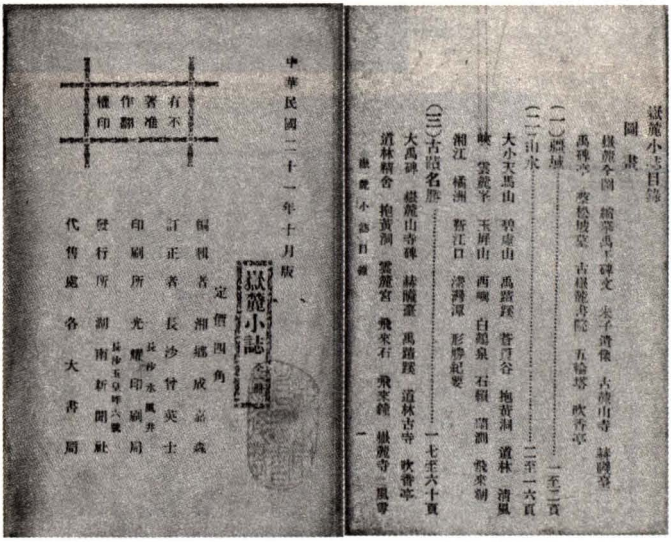
《岳麓续志补编》书影


御製四書日講　二十六卷　十二本　二函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四十卷　二十本　二函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二十五卷　十六本　二函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二十四卷　十二本　二函
欽定周官義疏　四十八卷　三十二本　四函
欽定儀禮義疏　五十卷　四十本　五函
欽定禮記義疏　八十三卷　四十八本　六函
大學衍義 宋真德秀撰　四十三卷　八本　一函
五子近思錄　十四卷　三本　一函
右經史子集分貯肆櫥共叁百叁拾函計叁百
捌拾柒部叁千貳百叁拾壹本統計壹萬零伍……
拾肆卷又朔望道交存案刊
周易函書 胡煦著　五十二卷　三十本　一函
續修湖南通志監局官布政司理問瞿中溶齎辦

《岳麓书院新置藏书官书总目录》书影



王先谦《岳麓书院记事录存》书影



成嘉森《岳麓小志》书影

前　言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背负灵麓，前带湘江，左拥凤凰山，右揽天马山，苍山碧水相映，茂木清泉交织，幽静闲旷，风景独好，诚为天下名胜，读书圣地。书院创建于宋开宝九年(976)，甫四十年，即以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等规制齐全，山长学行兼善，生徒达至数百，而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赐额赐书之嘉奖。于是，鼓笥登堂者不绝于途，称名遐迩，号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又依三舍之法，而居潭州州学、湘西书院之上，以“潭州三学”积分升等之式而确立地方高等教育中心地位。南宋前期，张栻主教，朱熹讲学、更建，更使其成为湖湘学派基地，全国四大学术中心之一，生徒云集，致有“书院一千徒”之时谚流传，可谓盛况空前。从此，弦歌相续，学脉绵延，历宋、元、明、清，兴学不断，走过了千余年的风雨历程，完成了从古代到近现代学制的过渡，几经演变，发展成为今天的湖南大学，成为举世罕见的千年学府。

学府千年，岳麓书院是宋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缩影，展示着华夏文明的风采与辉煌；杏坛百世，岳麓书院是湖南学人的精神家园，乃至象征与符号，承载着湖湘文化的追求与理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

唐末五代，即公元10世纪上半叶前期，是岳麓书院的“始作”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其时湖南也是“风化陵夷，习俗暴恶”，岳麓山的佛教僧侣智璇等想以“儒者之道”来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就“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并派人远走京师，购买“经籍”收藏其中，使得深处乱局的湖湘之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有了一个安静的读书研究场所。湖南归入宋朝的版图后不久，地方当局就将智璇创办的教育机构改建成了岳麓书院。为了嘉奖僧侣的办学之功，当局还立碑载记，予以表彰。后来，当岳麓成为有名的儒者之区，名列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之后，怀有门户之见的儒家士大夫就避而不谈这段历史了。对这种“独以其僧”而“置之不道”的作法，南宋淳祐十年（1250）始任岳麓书院副山长的欧阳守道深感不公，因而将其记录在其文集《巽斋集·赠了敬序》中。殊不知僧侣兴办儒家教育是不必讳言的，它反映的是一种儒佛两家相互交融的文化现象。

宋开宝九年（976），湖南安抚使兼潭州（治所在今长沙市内）知州朱洞和通理郡事孙逢吉接管智璇的办学设施和图书资料，并在其基础上“因袭增拓”创办了岳麓书院。当时，书院有作为师生讲习场所的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有收藏图书的书楼，还崇祀孔子及其门徒。规模宏敞，设施齐全，初步奠定了岳麓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与格局。加以地方政府的重视，使得书院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学者，仅五六年时间，就“教化大洽，学者皆

振振雅驯，行谊修好，庶几于古”，[1] 改变了过去那种“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文化落后的局面。

咸平年间，书院获得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咸平二年（999），潭州知州李允则扩建院舍，并“请辟水田”，使书院获得了稳定发展的经费来源。至此岳麓书院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的规制完全确立。当时肄业院中的生徒有六十余人，过去的藏书显得不够用，于是李允则又于咸平四年（1001）二月二十日报告朝廷，请求赐予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最高权力机构）的经史书籍，不久就获得儒家经书的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这是岳麓书院第一次受到中央政府的关照。书院的兴盛，使得湖南“学者无将落之忧”，而有丢掉文化落后帽子的自豪之感，曾经的南蛮之地，此时已被人们比之于孔孟故乡，称其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2]

十一年之后，即大中祥符五年（1012），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他是见于岳麓书院史志的第一任山长。据史书记载，他“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于当时，著有《毛诗笺注辨误》八卷、《论语集解辨惑》十卷等经学著作，因此慕名而求学书院的生徒激增，达到数百人之多。[3] 原来的斋舍已容纳不下，遂请求太守刘师道再度扩建学舍。周式兴学岳麓的事迹受到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注意。祥符八年（1015），真宗皇帝赵恒在皇宫召见周式于便殿，拜其为国子监的主簿官，留在宫中讲学。然而周式以兴学岳麓为己任，坚持要求回山执教。真宗为这种执着的事业心所动，就赐给他对衣鞍马，使其归院主教。为了褒扬岳麓的事业，真宗除增

①陈傅良：《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见明万历《岳麓书院图志》卷八。
②王禹偁：《小畜集》卷十七，《潭州岳麓山书院记》。
③朱熹：《朱子文集》卷九七，《南岳处士吴君行状》。

赐皇宫藏书的副本给书院外，还亲笔题写了“岳麓书院”匾额。明代依其手迹刻制的石额至今还保存在岳麓书院陈列室中。

皇帝召见山长，赐书颁额，使得岳麓书院的声望日益提高，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人不绝于途，“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①] 岳麓书院遂成为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之一。

“天下四大书院”之说始见于南宋，但各家所指却有些不同。乾道九年（1173），范成大游衡州石鼓书院，在《骖鸾录》中有《石鼓山记》，首先提出此说：“始，诸郡未命教授，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山名也”。[②] 范成大之后，吕祖谦于淳熙七年（1180）作《白鹿洞书院记》，以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为天下四书院。[③] 王应麟《玉海》列“宋朝四书院”为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二说，在《学校考》中以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天下四大书院”，并指出“此外则又有西京嵩阳书院，赐额于至道二年，江宁府茅山书院，赐田于天圣二年。嵩阳、茅山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⑤]《职官考》中则有嵩阳而无石鼓。[⑥] 元、明以来，论者各执一家之言，孰是孰非，尚难定论。但我们注意到，在众多的说法中，岳麓书院是唯一一所为各家所共推的书院。这说明岳麓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也表明它已成为北宋书院建设的典范，冠于“天下四大书院之首”。

四大书院是在宋室初立之时，需要大量高层人材，而中央政

①张栻：《岳麓书院记》，见明万历《岳麓书院图志》卷八。
②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二十三集。
③吕祖谦：《东莱集》卷六。
④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七。
⑤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
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三。

府又无力发展地方教育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出资或组织民间力量兴办起来的，从总体上来说，都属于地方高等教育的范围，成为地方的高教中心。因此，它们或接受皇帝御赐匾额、学田，或获得皇家宫廷藏书，都受到了国家最高当局的重视。尤其是岳麓书院，它的山长还享有受到皇帝接见的殊荣，这是整个宋代书院史上唯一的特例。继山长周式以国子监主簿主持院政以后，天圣八年（1030）岳麓书院山长孙胄又由主管财赋并监察官吏的“漕臣”建议而被朝廷特授官职。山长由中央政府任命，也说明岳麓书院在宋初教育领域处于较高的地位。而最能说明岳麓书院高等学府地位的还是庆历新政以后出现的“潭州三学”。

潭州三学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

潭州州学创建于庆历以来大兴官学的运动中。按照宋制，天下士人必须通过考试合格才能进入县学，取得学籍，称县学生。县学生再经考选升州学。州学生每三年有一次考选拔贡升入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的机会。[①] 就其层次而言，州学属于高等教育机构。潭州下辖长沙、衡山、安化、醴陵、攸县、湘乡、湘潭、益阳、浏阳、湘阴、宁乡、善化十二县，而两宋惯例潭州知州兼任湖南安抚使（管潭、衡、永、道、邵、郴、全七州及武冈军、桂阳监等共九个行政区域）兼任，因此，潭州州学除了所属十二县高材生外，也时有其他州县的学生肄业，这样潭州州学就成了湖南地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湘西书院在潭州城外湘江西岸，是咸平四年（1001）知州李允则扩建岳麓书院之后，奏请朝廷创办的，主要是为了缓解岳麓书院学舍紧张难以容纳就读学生的矛盾，在学生层次上湘西书院

①《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

也稍低于岳麓书院。

潭州三学由考试升降连为一体，据明代崇祯年间所编《岳麓书院志》记载："宋潭士目居学读书为重，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岸复建湘西书院。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生，又分高等，升岳麓书院生。潭人号为三学生。"三学生按层次分成三等，分居州学及湘西、岳麓两书院中，他们的升降按每月考试的成绩而定。积分高者从州学升入湘西书院，从湘西书院升入岳麓书院。在三学中，岳麓书院是处在最高一级的。这样，"潭州三学"就成了岳麓书院最终确立其高等学府地位的重要标志。

潭州三学与北宋中后期三次大兴官学运动并推行"三舍法"有紧密的关系。在大兴官学运动中，宋初创办的好些书院被改为各级地方官学，如名列四大书院之中的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在景祐年间分别被改为应天府学、衡州州学。庆历以后，嵩阳、茅山、徂徕等书院都湮没无闻，白鹿洞书院也在皇庆末年停废。惟有岳麓书院经受了考验，借"潭州三学"的形式得以保存发展，并高居于官学之上，这说明岳麓书院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以其较高的教学水平与教育质量赢得州县官学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

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一直保持到南宋末年。据《宋史·尹谷传》记载，德祐元年（1276），元兵围攻潭州时，岳麓、湘西两院师生放弃院舍撤入城内，"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当潭州保卫战进入最艰难的时候，三学生又毅然放下书本，拿起武器，与军民共同战斗，其中90%的人在这一战役中牺牲。在民族危难之时，三学生所表现出的可贵的民族大义与爱国精神，受到世人的敬慕，无论是元代官修的《宋史》、明清之际的《宋元学案》，还是现代人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元、明以后数百年，潭州三学的体制虽然不复存在，但岳麓

书院自宋代以来所确立的湖南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却丝毫没有改变。

岳麓书院在北宋成为湖南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心，确立了它在教育领域冠首全国书院的崇高地位。到南宋，书院的主持者们积极进行学术建设，使之成为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大本营，人称宋代学术“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①] 至此，它又确立了其在全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吕祖谦的丽泽书院、陆九渊的象山书院一起，并称“南宋四大书院”，即代表湖湘学、程朱理学、中原文献之学、陆王心学的全国四大学术中心。

这时它的体制更为完备，形成了由山长、副山长、堂长、讲书、讲书执事、司录、学录等构成的山长负责制的教学管理体系。教学上由于张栻、朱熹及其门人等倡导，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吸引着三湘四水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全盛时，学生达到千余人，以至有“道林（寺）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时谚，还有学田五十顷以供师生费用，可见其规模之盛大。

南宋末年，岳麓书院师生参加了悲壮的潭州保卫战，英勇抗击元军，但元代统治者并未因此而废弃这个一代文化名区。元至正二十三年（1286）、延祐元年（1314）曾两次加以修建。岳麓书院仍然规制宏敞，有礼殿、斋舍、讲堂、尊经阁、诸贤祠、百泉轩，以及其他亭、台、门、庑、庭、馆等建筑群。教学上它继续倡导不务记诵、辞章、功名而求审思、明辨、慎思、笃行，造就传道济世之人材的办学宗旨，保持了教学、研究并重的高等学府的气度，成为各地书院效法的榜样。如书院极为发达的江西，其

①《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